



守正创新 知行合一

——顾炎武的治学之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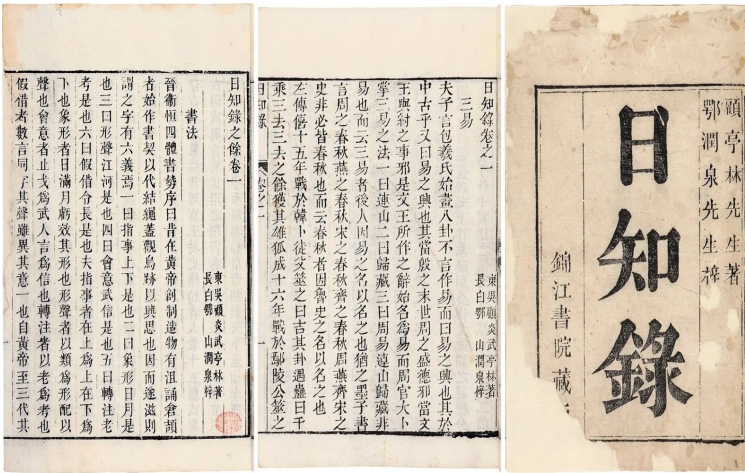
□ 高玉敏 纪芬叶



明清之际，主张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顾炎武，一生以天下为己任，誓不仕清。当清朝的统治局势已经稳定后，他毅然选择了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，通过治学来寻求“明道救世”之路。这也使得他的治学之道呈现出以经世致用为要、以考据实证为主的鲜明风格，开清代朴学风气。清代学者潘耒盛赞顾炎武：“综贯百家，上下千载，详考其得失之故，而断之于心，笔之于书，朝章国典，民风土俗，元元本本，无不洞悉，其术足以匡时，其言足以救世，是谓通儒之学。”近代学者梁启超评价他说：“论清学开山之祖，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。”

反对空谈,回归经典

清代的学术兴盛建立在反对宋明理学的基础之上。顾炎武对魏晋的清谈及宋明以来理学、心学的空谈都持反对态度，他在《日知录》中说：“刘、石乱华，本于清谈之流祸，人人知之。孰知今日之清谈，有甚于前代者。昔之清谈谈老、庄，今之清谈谈孔、孟，未得其精，而已遗其粗；未究其本，而先辞其末。”认为清谈背离了儒学经世致用的宗旨，仅仅是治学的细枝末节，必须回归到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根本上来。为此，他提出“舍经学无理学”“鄙俗学而求六经”，主张立足文字音韵的考据来解释古经，避免臆断解经。《清史稿》说顾炎武，从少年到老都手不释卷，到各地游历时，用二马二骡载书，甚至在马鞍上默默背诵儒家经典的注疏。他这种读书治学回归儒家原典的做法，深刻影响了乾嘉学者的治经方法。清代考据



学兴盛，固然有文字狱的因素影响，宋明理学发展到极致而发生转折的促动，也与顾炎武的大力推动有重要关系。

博学致新,开创朴学

顾炎武从理念、方法、规范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治学观点，开创了清代朴学。在治学观念上，顾炎武明确反对以功名利禄为目的而著书立说和治学，认为“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，皆学之事也”“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，制之为度数，发之为音容，莫非文也”。他认为世间一切，从个人的为人处世到天下国家各种制度，都属于“文化”的范畴，都是应当学习的事情。做学问就是要“明道救世”，要把读书治学和家国天下紧密联系起来，抛弃名利思想。只有“明道”“纪政事”“察民隐”之类的文章，才是对天下、对将来有益的文章，才能在天地间广为流传。而达到这个标准的文章多一篇就多一点益处，对天下都是有利的。

在学术范式上，顾炎武的经学研究不仅仅是就经书而研究经书，还广泛涉猎了史学、小学、金石考古、方志舆地等方面，使当时的学术研究领域大为拓展，开清代学术风气。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罗列了清代学术史的13个门类：经书的笺

释、史料搜补与鉴别、辨伪书、辑佚书、校勘、文字训诂、音韵、算学、地理、金石、方志编纂、类书编纂、从书校刻。顾炎武都多有涉猎。他在撰写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时，一方面广泛搜集史籍、实录、方志及文集文献资料，另一方面对山川要塞、风土民情作实地考察，此书除详细记载舆地沿革外，收集的赋役、屯垦、水利、漕运等资料也相当丰富，是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史籍。顾炎武学术视野开阔，对同一个问题能够从不同视角进行探索，使研究更为深入和透彻。清代儒学大家戴震、段玉裁、王念孙、俞樾，乃至后来清末民初的章太炎、黄侃等，都受到了顾炎武治学思想的影响。

在治学方法上，顾炎武主张“博学于文”。顾炎武为学，不仅征之以书，还征之以友，征之以实。居于穷僻之域，他感叹“独学无友，则孤陋而难成”，如果足不出户，又不读书，就像一个人整天面对着一堵墙一样，毫无收获，即使品德再高尚，对天下也是不会有任何贡献的。顾炎武提倡的“博学于文”并不仅仅是向书本学习，还要向各方面的人才学习。他在游历过程中，每经过一个地方，都要向常年生活在当地的人了解风土民情，一旦发现和自己掌握的情况不一致，马上查阅书籍进行对照，所以顾炎武的知识体系非常完备，既有高文典册的基础，又有田野采风的实地

考察，达到了“博学”的层面。

在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上，顾炎武主张“行己有耻”的道德原则，坚决反对模仿、剽窃。很多领域和问题虽然古人已经多方涉猎，但是顾炎武认为一定还有古人没有研究透彻的地方，可以寻找新的材料、新的方法、新的角度，这些都是后人可以继续努力的研究方向。古音学从南宋肇始，历经元明，至清而达到传统音韵学的高峰。但事实上，研究先秦两汉的语音，宋代吴棫所用材料上至先秦、下至隋唐，芜杂不清。材料问题直接影响了结论的真实性，始终不能令人信服。顾炎武发现了这些问题，他从新的视角出发，直接将研究材料限制在先秦时期，通过深入研究考证，提出了新的论断，从根本上改变了南北朝以来学者对音韵问题的看法，被誉为清代古音学奠基人。

注重致用,知行合一

《清史稿》评价顾炎武说：“炎武之学，大抵主于致华就实。”顾炎武认为儒家经典本身就是注重实用的，像《易经》使人“无大过”、《诗经》使人“思无邪”，而《尚书》是记“三圣”之事等。孔子曰：“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顾炎武始终信奉这个原则，为了学术研究最终能有益于天下、苍生，做到知行合一，顾炎武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人生壮游。在江南苏州一带武装抗清失败后，顾炎武的足迹遍及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，“垦田于山东长白山下，畜牧于山西雁门之北、五台之东，累致千金。遍历关塞，四谒孝陵，六谒思陵，始卜居陕之华阴”。“生无一锥土，常有四海心”的顾炎武，怀着“匹夫之贱与有责焉”的爱国情怀，带着“纪政事，察民隐”的务实目的，壮游四方、砥砺前行，在知行合一的实践中开创了清代的朴学之风，创新了学术理念，也为后世的学术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。



像藤一样顽强生长

□ 邹娟娟

从前，我觉得藤很普通，所以很少关注它，几乎分不清藤类植物，只有在果实成熟时，才能叫出名字。母亲笑我见识浅，不知藤生存的艰难和攀爬的韧劲。听了母亲的话，我便开始留意这些藤状植物。牵牛花，生命力顽强，随遇而安。在烂根草堆、污水沟里均开出精巧的花，形如喇叭，绝不低垂。它们的藤细细长，可弯曲，可绷直，弹性十足。野地里的藤大多如此，物竞生存，只能努力适应环境。爬山虎通体是藤，灵活的“脚”能裹住一棵大树、一片河岸或一整面墙。它要是乐意某处，定全力以赴地占据。从一个方向看，它们的叶如同被风梳理过，齐整油亮。若是相连成片，定看不到边。新叶迭出，旧藤仍在。风雨兼程，攀爬竞延，从无停息。

人工栽种的藤，比野外的藤多了搭建的平台，利于它顺势而上。母亲三月份开始下种，发芽后移秧。株与株的间距有讲究，通风，向阳，让它们快速长出“小手”。那些小手很敏感，一旦牵住，就牢牢握紧。母亲有时会“拔藤助长”。绳子搭猪舍顶部，一端系装满水的矿泉水瓶，另一端系地面的藤。连牵带拉，那些原本匍匐地面的藤，慢慢爬上了墙，爬上了猪舍顶，甚至往旁边高大的水杉树上靠。对于那些在竹竿下迟迟不见动静的藤，母亲时常以拇指绕上柔嫩的藤头，引它在竹竿上缠两圈，不多久，细藤们便乖乖沿着规划的路径向前攀爬。藤，枝蔓挪移，给田园描画细腻动感的绿边。

故乡的豆类，藤缠得紧，花开得密，荚结得多。半月形的红扁豆，是主要经济作物。农人们勤施肥，整枝打顶。打扁豆冒出头，每一寸叶茎都是紫红色的，藤头冲天而上，直至云霄。鸟雀钻进飞出，身上似乎也染上了绚烂的紫红。夏秋收获季，人们在行间采摘，进入一个绚烂热烈的世界。

果实大的藤，不能被竹竿左右，它们依附平地，匍匐而行。南瓜藤、冬瓜藤粗粝臃肿，茎上长满硬绒毛。凭这副厉害的尊容，逼退了众多入侵者。红薯藤柔婉秀气，茎碧绿水嫩，果实成熟前，免不了被覬覦。人们割下几段，加蒜瓣清炒。即使中途被打扰，也不妨碍最终硕果累累。西瓜藤非多益善，主藤副藤各留一根，专心伺候，一藤一瓜即可。心无旁骛，方能结大果。

很多藤类植物外表普通，作用却不容小觑，可入药。童年，我常到沟渠边采一种俗称“黑丑”的藤生中药籽。所谓“黑丑”，顾名思义，结的果，外表丑陋，枯焦不成型，但能卖好价钱。古人在《诗经》中写道：“爰采唐矣？沭之乡

矣。”人们采的就是菟丝子，无叶，只开花，依附其他植物生长，显得脆弱，但它是一味很好的中药材。

这些藤状物天生不像树木有铮铮筋骨，如果有，它们何须攀缘。树木的根可以扎得很深，寿命亦长，而很多藤类，随着季节会慢慢枯萎。有些在秋冬，随一把火，灰飞烟灭。躲过严寒和野火的，有藤萝、凌霄、葡萄等根系发达的多年生藤类。

藤，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延长着自己的生命线。根系扎稳后，拼命往前，蔓生，爬藤，勿管逆境，勿管污浊，冲向阳光，迎接温暖，时刻呐喊着：“开花，开花！”一开就密密匝匝，成串成簇，极显生命的壮丽。在曲折中绽放独特的芬芳。无论哪种藤，不管卧立何方，盘曲如长龙，一株，便可独秀！

水陆草木，可爱者甚蕃。像藤一样顽强生长，必然带来绰约多姿的精彩。看，青山葱茏、田野起伏，其中，定有绵延不息，翻涌不止的藤蔓！



三朝名相韩琦的贤能

□ 贾正东

韩琦是北宋著名政治家，他一生经历宋仁宗、英宗和神宗三朝，两朝顾命，在北宋中期的政治舞台上具有重要地位。他与范仲淹率军抵御西夏，在军中颇负盛名，素有“韩范”并称之美誉；在政治改革方面，他积极支持庆历新政；在地方任职，他广施善政；在朝廷为相，他勤劳王事、辅佐三朝。《宋史·韩琦传》曰：“（韩琦）与富弼齐名，号称贤相，人谓之‘富韩’云。”

经略陕西，抗击西夏。宋仁宗宝元元年（1038年），西夏王李元昊正式称帝，国号大夏，紧接着便率军入侵宋朝延州（今陕西延安）等地。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，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。宋仁宗之所以选中韩琦，并非偶然。一直以来韩琦十分关心西北边事，对边防情况相当了解，之前他就西北边防状况曾多次上疏仁宗，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

建议。韩琦到任陕西后体恤边民、减免租税徭役、安抚民心，严令军纪、赏罚分明。针对宋军士气低沉、素质良莠不齐、边备松弛等问题，韩琦又向仁宗上《周历边塞陈利害奏》《陈用兵练卒之策奏》等奏章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。他积极练兵、整顿部队，着重强调训练精兵、奇兵，加强军队间的配合策应能力；还十分注重提拔人才，如智勇双全的狄青就深为他 and 范仲淹所器重，成为抗击西夏的一员猛将。韩琦还大兴营田，征用土兵（西北当地的兵士），使军事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，既可以发展生产，增加当地军需供应，又可以减轻朝廷物资输送压力，从而巩固边防。经过多年经营，宋军战斗力得到很大提高，边防得到了有效巩固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西夏的侵掠活动。韩琦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，相互配合，人称“韩范”，在军中获得了很高威望，当时边

关还有歌谣传颂：“军中有一韩，西贼闻之心骨寒；军中有一范，西贼闻之惊破胆。”

公忠体国，支持新政。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，因守边有功，范仲淹和韩琦奉调回京，范仲淹任参知政事，韩琦为枢密副使。北宋中期，国势日趋衰弱，面对内忧外患和国库空虚的状况，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士大夫感到必须采取改革措施，才能摆脱困境。庆历三年九月，范仲淹等向仁宗上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“庆历新政”。作为范仲淹的助手，韩琦支持并参与了这场新政，他针对军事和吏治方面提出了改革建议，即“七事”和“八事”；大力支持盐法改革、冒著背负“朋党”罪名的风险为改革派辩护。由于新政触及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激烈反对，改革以失败告终。韩琦虽然因新政期间主要忙于宣抚陕西、宋夏议和等西北边务，直接

参与新政的具体事务并不多，但在这次变法中充分体现了他的见识、策略和气度。韩琦不畏权贵的态度和正直敢言的作风，给宋仁宗和僚属留下了深刻印象，这为他后来被再次擢升奠定了基础。

力行善政，造福百姓。韩琦一生担任过多个地方的主政长官，所到之处，他体恤民情、广施善政，赢得了百姓的赞誉。曾巩评价他“万里耕桑无一事，三朝功德在生民”。宝元二年（1039年），四川旱灾严重，饥民遍地，韩琦被任命为益、利路体量安抚使。他入川后减免赋税，惩办办事不力的官吏，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发放给饥民，在四川各地积极赈灾施粥，史料记载救活的饥民达190万之众，四川百姓对韩琦无不感激，说道：“使者之来，更生我也。”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，韩琦任定州知州并兼定州路安抚使，当时的定州作为边城重

镇，长期由武将镇守，军纪废弛，士兵骄横散漫。韩琦到任之后，大力整顿军纪，恩威并行；他又研习兵书，自创阵法，令军士日夜操练，定州军一时成了“精劲冠河朔”的军事力量。韩琦在定州任职的几年期间，河北屡遭水旱灾害，他积极放赈救灾、拯救百姓。韩琦还十分重视教化作用，创建州学，教化民众。他从定州调往并州时，“官吏皆泣下，既而道路士庶，哭声动原野”。在韩琦任职过的扬州、定州、并州、相州等地都有百姓为韩琦立的祠庙，河北大名为他立了生祠，可见其善政惠及很多地方和百姓。

为相十载，赞辅三朝。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，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，后拜枢密使。嘉祐三年（1058年），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成为宰相。此时正逢皇帝传位危机，宋仁宗三子相继夭折，皇嗣一直

未立，太子历来被视为国本，朝廷内外深为担忧。韩琦身为宰相，对立储之事十分关心，他屡次上疏建言：“皇嗣者，天下安危之所系！”力谏宋仁宗从宗室中选择贤德之人立为太子。在韩琦的极力劝说下，仁宗于嘉祐七年（1062年）立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（赐名赵曙）为皇太子，由此避免了帝位之争，稳固了朝政。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，仁宗去世，赵曙即位，是为宋英宗。英宗被确立为储君，韩琦应推首功，但他从不在别人面前夸耀此事，并尽心尽力辅佐英宗执政，立下扶危定倾之功。治平四年（1067年），宋英宗病逝，颍王赵顼即皇帝位，是为宋神宗，韩琦又有拥立之功。韩琦一生“相三朝，立二帝”，忠心耿耿、勋业赫赫，既巩固了宋朝统治，也使百姓免于因政局不稳导致的战灾频仍、生灵涂炭。欧阳修称其“临大事，决大议，垂绅正笏，不动声色，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，可谓社稷之臣矣”。

